

#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金富军<sup>1</sup>, 蔡乐苏<sup>2</sup>

(1. 清华大学 校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4; 2.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作者简介] 金富军(1976-), 男, 甘肃兰州人,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教育研究; 蔡乐苏(1952-), 男, 湖南益阳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 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提倡科学, 批判传统, 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作乱, 是迷信、宗教的产物。1924年以后, 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 对义和团重新评价, 充分肯定其反帝国主义性质。陈独秀认识转变的主要原因是1924年兴起的废约运动。

[关键词] 陈独秀; 义和团运动; 辛丑条约; 《新青年》; 国民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230-05

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对它的认识与评价, 伴随着义和团的兴起就已经开始, 毁誉参半, 褒贬不一。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和评价,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大革命时期, 也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这种变化, 不仅仅反映个人认识的变化, 更反映着时代思潮的重大变化。

##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思想文化方面他“求新择优”<sup>[1]</sup>(第64页), 在《新青年》揭橥的“民主”与“科学”大旗下, 他批评“国粹派”表现出来的“民族自大狂”, 同时提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开放精神, 批判“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 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着重国民性的改造。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回顾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后沉痛地指出: “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 匪独力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各国制度文物, 形式虽不必尽同, 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 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 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 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 以冀抗此潮流, 是犹有锁国之精神, 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 其国将以和图存于世界之中?”一句话, “勿尊国”而已。

他对义和团如何看待呢? 正如瞿秋白指出的, 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是一种“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义和团运动缺点很多, “他们拒绝一切‘洋货’, 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真以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义和团这种不加区别, 一概排斥的极端做法, 正是陈独秀所极力反对的“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

陈独秀在推崇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的同时, 更将科学看作是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 陈独秀对宗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sup>[2]</sup>(第9-10页)。在《科学与基督教》中, 陈独秀猛烈抨击基督教, 认为基督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sup>①</sup>。并且“对宗教的批判, 一开始就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起来, 因为宗教代表旧的文明。他在对儒学的尊崇中看到一种对理性的令人生厌

的漠视。这又为道、佛的迷信和超自然主义所加强。”<sup>[3]</sup> (第61-62页)

陈独秀认为,造成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的画符咒语等迷信邪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第二是佛教的灵魂世界和迷信,第三就是孔教,儒、释、道合一的戏,宣传封建迷信,等等。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这些因素,则“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在陈独秀看来,这些封建迷信糟粕,和现代科学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义和团盲目排外以及封建迷信,均是这个时期陈独秀所极力反对的。因此,陈独秀严厉批评义和团,甚至认为它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当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念的人把迷信和非理性视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痼疾”而加以抨击。新文化健将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贬斥义和团的迷信活动”<sup>[4]</sup> (第194页)。不光是陈独秀,在整个《新青年》阵营看来,义和团是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对义和团的反思,只是激起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一个历史记忆而已<sup>[5]</sup> (第30页)。

## 二

有研究者认为,“义和团事件到1921—24年又再次被提及,时间正与另外一件今日差不多已无人知晓的事件——华盛顿会议大致相同。这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被定性为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在这种视野下,看不到对义和团排外和愚昧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把义和团视为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sup>[5]</sup> (第30-31页),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新青年》群体出现分化,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并非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典型如胡适,其一生始终抱定自由主义立场。其次,就陈独秀而言,在1924年9月以前,并无有关义和团言论。第三,1924年陈独秀等人重提义和团并肯定其反抗帝国主义精神,原因也不在于华盛顿会议,而是另有原因。

陈独秀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没有发表对义和团看法,似乎可由此“遗忘”。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被遗忘的事情总是那些被认为相对不太重要的事情。

1923年10月20日,陈独秀发表《青年们应该怎么做》,指出:从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以外,国人都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般度日。从戊戌变法以后的重大运动中,只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并没有提及义和团。12月1日,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将甲午战败以后30年期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1924年2月1日,陈独秀发表《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文章提到庚子赔款,但没有提及义和团。陈独秀这样反复申述,努力建构国民革命运动历史的发展脉络。但在此脉络中,并没有给义和团留出一席之地,表明陈独秀并未将义和团纳入国民革命运动中,并不把义和团看作群众革命运动。陈独秀此时看轻甚至忽略义和团的态度,可想而知。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北京政府要求外交团向苏俄移交旧俄使馆,外交团以《辛丑条约》为借口,拒绝移交。在北京政府与外交团交涉的同时,共产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矛头直指外交团引为法理依据的《辛丑条约》。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国人受《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签订的鼓舞,才兴起废约运动。实际上,与其说是受鼓舞,不如说是受移交使馆事件刺激而发起废约运动。从废约运动的要求废除《辛丑条约》并将《辛丑条约》签订之日定为“国耻日”<sup>②</sup>,也可以看出这次运动,实际上是受移交使馆事件刺激而起。

6月底,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人类永久和平之关键安在》长文,“纵论古今,横说全球”,批评西方列强和《辛丑条约》。随即,上海《商报》发表陈布雷的文章,批评外国在华公使与商人。这两篇文章成为废约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文献,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种群众团体,支持和推动废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7月13日,国会议员胡鄂公等人发起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在共产党推动下<sup>③</sup>,反帝大联盟在全国引起反响,天津、济南、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纷纷成立分会。8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表示支持。

在移交使馆事件以及废约运动激发下,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有一个较大的转变。

这年9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第81期“九七特刊”,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改以往忽视甚至贬斥态度,转而将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并列,充分肯定义和团的历史意义。陈独秀认为,国人存在两个错误观念:第一,“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第二,“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陈独秀指出义和团不是野蛮的排外,之所以排外,是因为列强对中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是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的反抗,是正义的反抗。“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其重要并不减于辛亥革命”。这样,一方面充分肯定义和团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将义和团与辛亥革命联系起来,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赋予义和团革命的正当性。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事件只是一种历史记忆”<sup>[5]</sup>(第30页)，“五四”以后到1924年9月,义和团被“遗忘”,那么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可谓有了极大的转变。陈独秀将义和团纳入国民运动序列,成为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并列的四件重要事情之一。

归纳起来,陈独秀此时对义和团形成了几点新认识:第一、充分肯定其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精神。第二、将义和团纳入中国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中,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义和团从视野之外到占据中心,其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充分重视。

在同期《向导》上面彭述之、蔡和森等人的文章,也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以及义和团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蔡和森甚至认为辛亥革命意义反不如义和团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1924年之前,李大钊、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对义和团均持较低评价。但是,自1924年9月,则对义和团的评价有一个整体性地转变,除陈独秀外,蔡和森、彭述之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都撰文,肯定义和团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进步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是1924年的移交使馆事件以及其引发的废约运动,而并非华盛顿会议,促成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评价发生整体转变。

1924年9月《向导》的“九七”特刊,以及1925年9月《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继续出的“九七特刊”,这些文章的评价分析,对以后共产党认识义和团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认识、评价义和团的基本出发点。1931年华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1940年杨松、邓力群合著《中国近代史研究大纲》,1945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等对义和团的评价,基本因循1924年的认识框架。加之毛泽东<sup>④</sup>、周恩来<sup>⑤</sup>等对义和团作出了官方权威性的评价,1924年共产党有关义和团认识、评价从观点到方法,新中国建立之后就成为了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义和团是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评价成为不争之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的中国,伴随着社会政治领域内共产主义变革,思想领域内与之对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地位的确立。唯物史观地引入,使得对中国历史进行比较激进地再解释成为可能。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不仅如此,唯物史观在知识分子中流行,除了作为一种方法优点外,还在于它与当时革命问题相关联<sup>⑥</sup>(第1-4页)。唯物史观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存在以及各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俗民情,具有很强的理性说服力,于是取代了进化论那种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和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sup>⑦</sup>(第145页)。而这种取代,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具体而现实的工作实现的。陈独秀在1924年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陈独秀对义和团的分析,却是很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典型范例。正是陈独秀以及同期彭述之、蔡和森等人的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在中国初步建立起影响深远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sup>[8]</sup>(第8-9页)。

何王之先生曾指出:“‘现在’一语,包括着目前一切社会现象”<sup>[9]</sup>(第1页)历史研究总是带着研究者

本身所处时代的印记,研究者只能根据“现实”对“过去”提出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所处时代历史意识、政治环境等影响。同时,作者还受到自身经历、认知模式(对研究对象分析采用的观点、分析方法等)等很大制约。并且,“并不是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都能够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只有被人们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历史文本。”<sup>[1]</sup>(第6页)研究什么历史问题?如何研究?大都是研究者与所处时代环境互动的结果。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注 释:

- ① 张灏先生认为“五四”思想存在两歧性,即“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新年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看会一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这种矛盾反映到陈独秀的宗教观上,表现为陈独秀在1920年前后,又对宗教进行价值重估,肯定了宗教在净化和美化感情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思想只持续了很短时间,随着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批评又严厉起来。[美]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79页。
- ② 在此前,让中国人民最感痛心的是“二十一条”,袁世凯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5月9日也成为“国耻纪念日”。在1924年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提议“九七国耻纪念日”以前,这是惟一的广为接受的“国耻日”。直到1924年6月,国内反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仍是“二十一条”,而非《辛丑条约》。例如1924年5月1日,李大钊在《这一周》中,仍特别提到“五七”纪念日。(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6月9日,长沙市民六一纪念大会,6月7日,上海市民大会,均提反“二十一条”口号和警告,而不涉及《辛丑条约》。《长沙市民举行六一大会》,《晨报》,1924年6月9日,第5版。《上海市民大会将警告加藤》,《晨报》,1924年6月10日,第2版。)这种斗争对象在一个月内的迅速转移表明,重新确定“九七国耻”和纪念《辛丑条约》并非自发,而是有意为之。因此,1924年9月7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高尔松的《纪念九七国耻》提出“九七纪念是由辛丑条约而来的”,谈到“九七”取代《南京条约》签订之日的八月二十九和袁世凯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原因时候,认为前者“可以使我们痛心的程度”,比后者“深切而沉重”。且“二十一条”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且未经国会同意,而《辛丑条约》则是中国与八大强国之间的事情,涉及范围更广,约束力更大。这个解释逻辑上颇为牵强,事实上出未能真正点明当时废约运动真正的所在。
- ③ 考察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的发起者和执行者,可以发现骨干分子主要是共产党员。例如湖南发起人中,郭亮,罗学瓚,夏曦,熊亨瀚,萧述凡,萧石月等人是共产党员。上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设在国共合办但共产党员控制的上海大学,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经常给大联盟作演讲。杭州民起人中,有俞秀松、安体诚等,其中安体诚是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杭州组组长,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成立宣言就是由共产党员王尽美亲自起草,武汉反帝国主义同盟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陈潭秋。
- ④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32页。
- ⑤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河屠杀。中国人民在这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 [参 考 文 献]

- [1] 朱文华.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特点[J]. 学术月刊, 1994(3).
- [2]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3] [美]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4] [美]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 5 ] 金观涛, 刘青峰. 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J ]. 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4, (4).
- [ 6 ]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M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 7 ] 李泽厚.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C ].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 8 ] 陈振江.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C ]. 苏位智, 刘天路.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 [ 9 ] 何干之.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序论. 民国丛书: 第 2 编第 78 册[ G ]. 北京: 当代青年出版社, 1937.
- [ 10 ] 韩 震, 孟鸣歧. 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 11 ] 陈独秀. 敬告青年[ J ]. 新青年, 1915, (1).
- [ 12 ] 独 秀. 学术与国粹[ J ]. 新青年, 1918, (3).
- [ 13 ] 秋 白.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州运动之前途[ J ]. 向导, 1925 (128).
- [ 14 ] 陈独秀. 克林德碑[ J ]. 新青年, 1918, (5).
- [ 15 ] 独 秀. 青年们应该怎么做[ J ]. 中国青年, 1923 (1).
- [ 16 ] 独 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J ]. 前锋, 1923 (2).
- [ 17 ] 陈独秀. 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 J ]. 前锋, 1924 (3).
- [ 18 ] 独 秀. 我们对于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 J ]. 向导, 1924 (81).
- [ 19 ] 陈独秀. 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J ]. 新青年, 1924 (4).
- [ 20 ] 和 森.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J ]. 向导, 1924 (81).

(责任编辑 桂 莉)

## CHEN Duxiu's Reappraisal of the Boxer Movement and Its Political Meaning

JIN Fujun<sup>1</sup>, CAI Lesu<sup>2</sup>

(1.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History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Biographies:** JIN Fujun (1976-), male,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s and culture; CAI Lesu (1952-), male,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s and culture.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CHEN advocated held the flag of science highly and animadverted Chinese tradition, he criticized the Boxer Movement as a rebellion of mosstrooper and regarded it as the result of superstitions and religion. After 1924, u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EN reappraised the Boxer Movement and praised its spirit of anti-imperialism. The main reason of the cognition's variety is the Abolishing-Unfair-Treaties Movement which rised in 1924.

**Key words:** CHEN Duxiu; the Boxer Movement; the Boxer Protocol; *New Yout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